

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

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 谭桂林 龚敏律 著



岳麓书社

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

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

◎ 谭桂林 龚敏律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谭桂林,龚敏律著.

长沙:岳麓书社,2005

ISBN 7-80665-692-8

I. 当... II. ①谭... ②龚... III. 当代文学-关系
-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I206.7②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2608 号

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

作 者:谭桂林 龚敏律

责任编辑:马美著

封面设计:周 畅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75

字数:236 千字

印数:1—3,000

ISBN 7-80665-692-8/G·485

定价:18.00 元

承印:长沙天彩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望城县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410200

电话:0731—8062219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总 序

凌 宇

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的构思分题撰写的,而是本学科一批研究者各自独立研究的成果。丛书的冠名,并非事先有意而为,而是事后所拟。然而,凑巧的是,这批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显明的主题取向,即追寻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成为这套丛书的整体诉求。

“文革”结束以后,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在政治层面上对作家作品评价的拨乱反正,并进而对长期独霸文学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批判与反思,到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从文化学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间,由于大量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西方新批评、新方法的译介与传播,其中一脉,即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影响所及,曾一度导致文学研究领域内形式主义思潮的泛滥。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声浪迭起,便是其表现。然而,或许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形式主义根基的先天不足,或许是由于形式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极端学派)

将文学创作看成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纯粹的形式运动与符号现象的观点,终究与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实践难以吻合,这种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不久便归于沉寂。然而,这一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虽并未在中国导致一场真正的形式主义运动,却也引发了研究者对文学文本形式构成的强烈关注。尤其在小说研究方面,法国叙述学的影响极为深刻,叙事研究并未导致对文学文本所述之事,即文学作品人生内容的漠视,从文化学角度阐释、解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生现象,同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学中的当然之义。人文是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文化艺术活动,是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它包括神话、宗教、历史、伦理、文学、艺术诸门类。人文相对自然而言,人文即人为,亦即人类文化的活动,是人类独立于自然的一种独有的存在方式。而人文精神即存在于人类文化活动中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诉求的总体指向。因此,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把握文学作品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与广延性;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本质及内涵的人文精神,无疑具有别的研究方法难以达至的真实性与本源性。因此,在经历了单一的社会学与阶级—政治论研究方法导致的诸多对作家作品的误读、认知的偏颇与价值判断的失误之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乃势所必然。然而,这种必然同样会导致这一研究方法的泛滥,乃至成为一些研究者既不考量自家身段,也不顾及研究对象特征的学术时髦。

因而,这套丛书冠名为“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便难免有趋众媚俗之嫌。但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或一套丛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研究对象采取何种进

人方式,而在于这种进入方式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即其研究方法能否对象化,对此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是否有所突破,对研究对象是否有新的发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经得起检验的。丛书各卷都是作者多年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潜心研究的结晶,而非应急赶制之作。其中,除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对旧作的重新修订之外,其余的均为新著。《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国内研究沈从文的第一部专著,曾在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这种影响的成因之一,便是作者从地域文化角度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把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方向,谭桂林是一位开拓性的研究者,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收入丛书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是他的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还有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这部从巫楚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意象的生成机制及文化品质的专著,同样颇见功力;而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从家族文化角度对 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的研究,则别开生面;吴培显的《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诉求为标尺,观照与辨析当代新潮文学的内在精神追求,考量其创作得失;赵树勤的《文化撞击中的突围表演——残雪论》,从残雪与本土文化、西方文化的复杂关联中来解剖当代先锋作家的一个经典个案,亦多新见。

文化及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其恒定性 with 变异性,即守常与流变并存。也就是说,任一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超越时空、恒常不变的文化因素,也有与世易移、不断变迁的文化因素。即便是恒

定不变的部分,也可能由于文化整体的变迁,在文化构成中的结构地位与具体表现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对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的把握,或流于空泛,或难以准确定位。收入丛书的其他几部著作,便是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文现象的梳理。宋剑华的《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不囿于人文精神的一般追寻,而是将其置诸作家个体的历史存在来考察,这种从个体存在出发探寻人文精神的尝试,似乎具有某种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李运抃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的学术专著,阐释人文精神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流变,成为其题中之义,且多新见;吴康的《新文学的本原》,则试图从文化思想史角度,理清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从文化精神的时空存在形式出发,还原文化精神的历史性,亦颇见创意;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侧重探讨五四激进主义的思想根源,五四激进主义思潮,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态,对其进行具体梳理与考察,无疑是一件具有学术意义的工作。

以上所述,不过是这套丛书各卷内容与特色的一个简要提示。它既难以穷尽全书的内容,对其特色的概述也只能得其一鳞半爪。而且,作为丛书的总序,大多类于商品广告,难免予人王婆卖瓜的印象。好在丛书一旦出版,便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成败得失、是非褒贬,批判的权力已在读者的手中。对丛书各卷的作者而言,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如闻一多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所说: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2005年9月10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汪曾祺：佛性与人性的
汇流 /12

一、乡风浸染与家学

承传 /14

二、暮鼓晨钟里的虔敬
之思 /19

三、以人本的立场观照
佛性 /25

第二章 韩少功：巫风浸染中的
浪漫寻根 /31

一、“寻根”宣言中的

巫楚文化情结 /32

二、巫性生命形态的审美
观照 /37

三、浪漫神秘的巫性思维
方式 /43

第三章	张承志:回归真主的心路历程 /53
	一、精神浪人的家园寻找 /55
	二、比较文化中的宗教释义 /59
	三、从文化寻根到血缘寻根 /66
第四章	北村:人性救赎的生命律动 /75
	一、现代文学中的救赎主题 /77
	二、寻父与弑父的心理悖反 /82
	三、从恐惧走向救赎 /88
第五章	史铁生:精神圣者的仰望之路 /95
	一、生命本相的诘难与澄明 /96
	二、救赎之路的神性之光 /110
	三、由佛入耶的文化思考 /129
第六章	阿来:藏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织 /145
	一、傻与灵的生存反讽 /147
	二、藏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织 /152
	三、傻子原型的诗学意义 /158
第七章	扎西达娃:坚守永恒的生命之魂 /163
	一、历史流变中的生命异化 /164
	二、文化冲突下的困惑与寻觅 /182
	三、时空交错间的皈依与坚守 /195
第八章	马丽华:藏传佛教文化的诗性写意 /209
	一、高原风景的灵魂触摸 /210
	二、藏传佛教的人文观照 /214
	三、文化融合与宗教沉思 /219
第九章	民间宗教与当代小说中的神秘叙事 /224
	一、楚巫文化与湖南乡土小说 /226
	二、民间佛道与贾平凹的创作 /235
	三、巫性思维与残雪小说 /240
第十章	朦胧诗:现代禅心与诗心的结合 /245
	一、现代文学中的禅踪佛影 /246

	二、朦胧诗的禅性思维 /251
	三、禅与朦胧诗的精神渊源 /256
第十一章	雅俗相融的台湾佛理散文 /259
	一、娓娓而叙佛家故事 /261
	二、在禅意中寻找生命的真谛 /265
	三、精神承继中的时代流变 /270
第十二章	宗教文化与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274
	一、寻找和确立文学史的依据 /276
	二、剖析人格建构中的宗教影响 /281
	三、指证方法与比较眼光 /286
	四、课题研究深化的展望 /289
参考文献	/297
后 记	/301

绪 论

20 世纪以来,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碰撞、渗透、交流日益频繁,文化比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学界流行开来。就中西文化的异同而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到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已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对中西文化的特征作了概括性与对比性的说明。譬如说中国文化是静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动的文化;中国文化重感悟,西方文化重分析;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等等不一而足。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课题中,关于文化传统中的宗教感一直是人们比较热心讨论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在政治上以礼教为纲,在文化上以儒家为主干,讲

人伦,远鬼神,重实用,轻玄思,因而国家的统治历来是政教分离,文化传统与国民意识也都缺乏宗教感。同历史上长期以宗教立国的西方基督教国家或者同至今仍然以宗教立国的伊斯兰国家相比较,这种观点是容易得到广泛认同的。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政治与宗教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宗教常常充当政治的顾问,统治者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谨慎地利用宗教作为统治的工具,但是如果宗教越过界线企图对国家政治进行操纵和干预时,每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会毫不迟疑地予以打击和镇压。每一种宗教都以天国的彼岸世界来否定现世的此岸世界,每一种宗教都在抨击强者对财产的掠夺与占有,但封建时代的政治本质是家族政治,为了维持家天下的长盛不衰,封建时代的政治家特别推崇以家族伦理为根本的儒家文化,以致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感的因素,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文化的构成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有时历史的吊诡使得文化的发展出现出其意料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正是由于宗教无法在政治上进入社会中心地带,促使宗教力图在文化上向中心渗透与挺进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与生存。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它所尊奉的老庄思想本来就是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在同儒家思想的论战中创立起来的,后来它成功地进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领域,成为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精神结构中的互补因素,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论依据。佛教来自西土,其理论、仪轨、戒律等等有着明显的异域特征,因而它的生存与发展比起本土的道教更具艰难性。但佛教因势利导,随乡入俗,根据中国的国情特征不断调整自己,终于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喜爱,成为中国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支十分重要而且能够同儒家主流文

化形成鼎足之势的力量。唐代大政治家也是大诗人的白居易说他在文化精神的选择上是“置身于儒，置心于佛”，也就是说在一生的事功上遵循的是儒家的原则，而在处理个人的心灵问题时则倾向于佛教的义理，这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精神共性。这种共性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文学的精神面貌，使得中国的古典诗词、小说和戏曲中到处都是佛光道影。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如果离开了佛理与道风的剖析与解读，许多问题的讨论就不过是隔靴搔痒。从这种历史事实来看，笼统地说中国文化缺乏宗教感也不免是片面之谈。

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虽然以儒家理性为根底，但因其博大精深，历史久远，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它能兼容并包，容纳吸收着其他异质文化的要素来丰富壮大自己，宋代儒家吸收佛教禅学以形成心学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所以，中国文学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根基，经世致用、兴观群怨是其主流倾向，但我们同样能够在中国文学那些最优秀的作品中读到人生如幻的出世之叹，关心国计民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固然是其基本主题，但演绎鬼斧神工、描画花妖狐魅也同样是中国古代文人津津乐道的题材。尤其是中国文学在儒家文化的制约下愈来愈板结干枯的时候，恰恰是处于在野地位的宗教文化为中国文学的更新和转化提供了新鲜的思想资料。^①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学之所以具有如此丰厚深刻的内涵，如此独特悠远的韵味，宗教文化因素的渗透融入是功不可没的。现代作家冯文炳在谈到中国文章时就有所慨叹，认为“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

① 刘熙载在《艺概》中就说：“文章蹊径好尚，《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

了一点儿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眼”^①。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亦可得到证明。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上看,中国现代文学本来是最不适宜于宗教因素生长与发展的,其一是因为现代新文化建立的一个基础是科学精神,而科学有史以来就是宗教的对立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反封建迷信曾经是新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其二是因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认知论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唯心主义为其认知基础的宗教意识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空间也就愈见狭窄。其三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动荡不安,风云乍起,政治启蒙与民族救亡两大尖锐的社会主题促使着这个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踊跃投身于时代的政治激流中,却很少有时间有兴致与自我的心灵进行对话,因而也就很少为宗教意识的渗透提供机会。但即使这样,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仍然是比较紧密的,不仅伴随着西风东渐的基督教文化为现代文学的主题、题材的扩大与发展提供了宽宏的背景,大量教会学校毕业的中国青年为新文学的创作准备了优秀的人力资源,而且佛教文化乘着晚清佛学复兴的热潮,一方面以其自由的气度、高深的学理、诗意的表达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显示自我精神深刻性的思想方式,一方面则以其与中国儒、道文化鼎足而三的文化地位,取代已经被新文化运动摧毁的孔家店成为现代作家与自己的母语文化传统保持精神联系的桥梁。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愈来愈被研究者们所关注,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相继出版并且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就

① 冯文炳:《中国文章》,《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页。

是一个很有力的说明。

正是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上,我们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研究的课题。在此首先要说明的是,以流行的分期观点来看,所谓当代文学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当前的文学,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被人为地切断。除了宗教人物偶尔作为反面形象如封建迷信的代表或者如反动势力的帮凶出现在意识形态日益强化的作品中,宗教文化对文学的精神性影响已经荡然无存,文学与宗教这一古老的关系事实上出现了一个三十年的断裂期。所以我们所谓的当代文学事实上只是指80年代以来的文学。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的宗教政策走向开明,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呈现出多元趋势,宗教影响的逐渐复归遂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有一些很突出的标志。一是一批涉及宗教文化题材的作品相继出版,如汪曾祺的《受戒》、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马丽华的《走过西藏》、北村的《施洗的河》、张承志的《心灵史》、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等等,这些作品出版之后备受关注,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二是90年代以来,有关宗教文化的出版物迅速增长,成了出版市场的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尤其要提到的是台湾佛理散文的风行大陆,林清玄、方杞、林新居等人的系列散文集一直是大陆书市的畅销读物,这些散文以清新优美的文字,宣扬人间佛教的精神,讲述自我修习佛法的体会,揭示工业社会中人类生存的困境和解脱困境的方法。台湾佛理散文在大陆的畅销,其意义不仅仅是使大陆读者了解到台湾社会的心理状态,了解到人间佛教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而且标志着经过思想解放的洗礼之后的

中国知识界对宗教文化的关注已经从文学界扩展到了大众读者,同时也说明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理问题出现了新的征候,需要更加多元化的方式予以应对。三是宗教团体与文化团体、宗教活动与文化活动的互动关系也在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提倡人们从事宗教活动,但对宗教这种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在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因而合法的宗教活动是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这种比较宽松的生态环境促使各种宗教形式在近年来都有所发展,尤其是宗教界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宗教文化对民族文化建设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毫无疑问,对当前宗教文化在文学领域的复归现象的研究其意义是重要的。首先,宗教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宗教的许多价值理念与生命智慧至今仍然是维持社会正义、道德与生态平衡的重要精神支柱。研究当前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无疑对我国当代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在人们的精神需求日趋多元与自主、而宗教也曾被某些别有用心者利用来作为危害社会稳定的工具的时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科学地辨析各种宗教对当前文学的影响哪些是积极的、有价值的,哪些是消极的、需要予以警醒的,这对我们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宗教文化精神与生命智慧来建设现代民族文化,就更具现实的指导意义。其次,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历史上,文学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对这种关系的探讨也从来就是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并且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可谓硕果累累,俊彦云集。所以,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成果既承继了中国文学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又填补了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在

民族的学术积累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再次,愈是有成就的作家,其精神结构就愈是复杂,宗教意识往往是这种复杂结构中隐藏最深、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层次,解析宗教意识与作家艺术个性之间的联系,能够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独特角度,能够深化对某些经典作品的主题理解。而且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研究性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文学、宗教学、比较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神学等多学科的人文知识,因而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也顺应了当前人文科学研究学科贯通的大趋势,是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打通学科界域的一次有益尝试。

但是面对这种文化现象,国内外学界的反应看来是比较迟钝的。从海外学界来看,不少海外学者对中国目前的宗教政策还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片面地认为中国的宗教活动还是处于压抑状态中,没有宗教,哪来的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所以他们只是努力地去发掘中国古典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而对当前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则视若无睹。从国内学界来看,对这一现象反应迟钝,我们认为主要是学者们尚未作好应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学理准备。因为研究这种文化现象,不只是要求学者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且应该具有比较丰富的宗教文化知识以及来自自身生命的对宗教现象的深层理解。目前关于此现象的研究无疑尚处于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成就在于,评论家已经开始尝试诠释北村、史铁生、张承志等著名作家创作中的宗教理念的体现。学界对宗教影响于文学的评价也从极“左”时代的单一否定转变为实事求是的宽容与理解,而那些明显具有宗教倾向性的作家已不再忌讳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初始阶段的缺陷则在于,所涉及的作家面尚不够宽广,对当前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还没有给予综合的、整体的、宏观的考